

儿童文学的坚守与拓新

□张 炜

也就不成立了。对于牺牲文学品质，追求市场与迎合趣味的某些“儿童文学”，我是不喜欢的。坚持追求高尚、高雅、深邃的文学品质，让儿童和成人都受益，这才是好的儿童文学。在历史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安徒生的作品，都难以发现今天市场上那些“儿童文学”的拿捏气味。这是不好闻的。海栖创作的所有儿童文学作品，气息都很好。能获得这样的成功，不仅在于他努力提高的创作技术，更在于他长期的人生阅历和道德坚持。这种品质，在目前的《风雷顶》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风雷顶》这部作品刚开始读时，感觉似乎不像海栖之前的作品那般“圆润”。但读下去，会觉得这正是《风雷顶》较之以前创作的进步之处，它用一种更自然、更原生态的方式讲述故事，更质朴自然，从而拓宽了当代儿童文学的书写。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非常需要作者用自己的嗓子来歌唱，需要作者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呈现。作者如果杂念多了，动作必然会变形。而海栖凭着内心的真诚，一路写下来，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卷。事实上，通常来说，作为作者必然会有种种考虑和顾虑，但它们最好不要影响文学的品质。儿童文学

应该有其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诗性、童真、淳朴等等。这些本质，在海栖的《风雷顶》中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儿童需要读到更多生活的真实，特别是上一代人的生活。那些粗粝的生活被一颗童心处理过，既是原生态的，又是当下的、新鲜可爱的。那一段生活离我们似乎很远了，但又如在眼前。它们所表达的童年意趣，与今天的孩子常常并无二致。也就是说，童心是相通的，生活是继续的。不理解过去的生活，也就不理解今天的生活，不会更好地向前。就这个意义上说，海栖为孩子们讲述的故事，既是常忆常新的，又是脍炙人口的。

海栖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的出版工作，在此过程中，他悟到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个老手，不是新手。这几年他写作的冲动很多，创造力如此旺盛，爆发力如此强大，因为肚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张力太强了。他曾经帮助过那么多儿童文学作家，有那么丰厚的生活储备，到了他自己动手创作的时候，大量的积累就一涌而出了。他还可以不停地写下去，他的创作丰华期刚刚开始。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2021年5月，刘海栖的作品《风雷顶》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部取材于作者父辈回忆、展现山东胶东地区抗战生活的少儿小说，为国内原创儿童文学吹来一股清新的风，上市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收获诸多社会好评。其中，张炜、徐德霞、胡丽娜三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儿童文学的本质、创作态度、战争书写和叙事艺术等方面，对《风雷顶》进行了精彩的点评。我们收集他们的评论文章与刘海栖本人的创作自述，呈现于广大读者，期待能对国内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有所裨益。

真心

真实

□徐德霞

真情

刘海栖做了几十年的出版，是全国有名的专业少儿社社长，工作期间培养了一批批作者，出版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畅销书和畅销书，也捧红了很多人，为少儿出版事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最近几年他华丽转身，开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以每年一两部的速度相继出版了《有鸽子的夏天》《小兵雄赳赳》《街上的马》等五六部长篇儿童小说，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在儿童文学界多年，惯见作家们起起伏伏，像海栖这样成功、热度不减的作者还真不多见。

我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出版一部就火一部，这到底是他个人的魅力，还是他作品的魅力，或者他本人加上作品的魅力？我做编辑多年，历来主张在稿子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个编辑力求做到只认稿子不认人，在差不多读过他近年出版的每一部作品之后，我认为，这种火爆首先源自他作品的魅力，其次才是他个人的魅力。

那么他的作品到底魅力何在呢？我想用三个“真”字来概括，第一个是真心，第二个是真实，第三个是真情。

说到真心，首先是海栖真心喜欢儿童文学创作。到了已经退休的年纪，写作不为稻粱谋，不为买房、育儿养家谋，更不为虚名而苦，他已经到了看穿名利、宠辱不惊的境界，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是发自内心的“我要写”。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怀揣着蛋的母鸡，憋得四处乱转，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在心中鼓荡，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都蠢蠢欲动，呼之欲出，千方百计也要找地方把这个“蛋”生出来，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感而发，不得不写。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创作更纯粹，心更真、情更满，笔下更有力，都是生活和情感的自然流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最好的创作状态，是最真心的。

今天，我们一说到给孩子写东西，有时就“端起来”，满脑子的条条框框，把写作这事看得很重，一副拉开序幕、要大干一场的样子。尤其是遇到出版社约稿，指定题材的时候，更容易顾下不顾上、顾左顾右，难以自持，束手束脚放不开，本来还蛮生动的一张脸立马不由自主变得严肃呆板起来。试想一个体操运动员，如果带着各种杂念上场，他的动作一定会走样变形。在这方面，海栖有自信、有底气，他就像儿童文学界的一匹黑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读者，这就是他的真心所在。

这种真心，反映到作品上那就是真实。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我们从字里仿佛能感受到生活的悸动，能感受到那种轻风过耳、花开有声的微妙。他笔下的故事无磕绊、无疙瘩，顺畅得像自然流淌出来的一样，似乎达到了某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境界，这在众多儿童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比如《风雷顶》这部作品，海栖写的是以老父亲为原型的胶东抗日故事，他从一个点、一条线、一个很小的切口进入，那就是听老父亲讲他自己的成长故事。作品用了父亲回忆的口吻，有很浓的纪实色彩，但它不是回忆录，依然是一部小说。作品的巧妙在于，作为作者的本人也进入到故事当中，把他怎么听父亲讲、怎么录音，90岁高龄的父亲和母亲是一种什么状态，都一一呈现出来，作品的真实感、现场感就很强。他自己身处其中的同时，也把读者自然而然地带到听父亲讲童年的情境之中，读者也是感同身受。试想如果他不用这种时空叠合的方式，而是单纯记录老父亲的童年故事和他成年以后的抗战故事，那该多枯燥，那种隔代的陌生感、陈旧感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他的老父亲对自己的童年、对自己90年来经历过的生活的回忆，本身便是一次创作，一次无意识的创作。因为他在讲的过程中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记忆的打捞，凡是打捞上来的一定是生活中印象最深刻、最珍贵、最难忘的东西。等到海栖自己再整理资料，再进行创作时，他已经是有意识的第二次创作。他把父亲的故事经过整理筛选，去粗存精、升华再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胶东农村的日常生活，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了。那时孩子们的玩闹游戏，从“老头看瓜”到“砸丧门神”，种种生动的细节，没有生活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写到战争的时候，他忠实于史料真实，同时又注重生活的真实，故事的丰满与人物形象的生动。他的笔触始终集中在父亲的口述上面，牢牢把握住个人的视点。这非常重要，让作品避免了很大而空的大小战役，而在故事中出彩的“点”与人物上。这也非常符合回忆特质，时过境迁，当年再残酷再激烈的战斗数年以后也会幻化为故事。比如孙天喜战场浴伏击一节，还有响枪爷、剩儿，还有耄耋之年返乡归真的父母，总让人在观看战时岁月的同时，被真实的生活所打动。另外在战时生活的描绘中，书里还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民间传说与故事，让作品充满胶东民间文化独有的色彩温度。

海栖笔下的作品，总能跳出概念化写作，不仅真实，而且充满了真情实感。海栖是讲故事的高手，尤其善于抓住人物的特征和事物的本质，三言两语就能将一个人物形象鲜活地画出来，这是他的本事。同时他的作品既有真情又自带幽默，好玩好读又温润。无论是他写的《街上的马》《小兵雄赳赳》，还是这部《风雷顶》，总能让人在会心一笑中找到真情和温暖。这份真情，在这部小说中尤其表现得自然真切，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因为这部作品源自真实的故事，满溢个人、家庭和家乡父老的真情，他的家国情怀是蕴含在深沉的故事和风趣幽默的叙述之中的。比如，书中写到的父亲母亲，既有满满的温情，又不失幽默，母亲明明已经脑萎缩自顾不暇，偏偏爱张罗着陪父亲一起出去玩。一说出去，她就说：“没事，没事，有我呢。”生活细处的幽默之外，两个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人相濡以沫的深情跃然纸上。海栖的每一本书出版后都能收获好评，大人和小读者都能看且喜欢看，与他作品中洋溢的这种趣味与真情实感相结合的风格是分不开的，《风雷顶》中就有很多这种生动、风趣的细节，同时坚持真实、真情的立场，必定会受到大小读者的喜欢。

另外，海栖是一座生活的富矿，他本人且处于创作的爆发期，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我们对他的充满期待。

(作者系儿童文学评论家，《儿童文学》杂志原主编)

童年书写和儿童文学叙事的自在探索

□胡丽娜

《风雷顶》是刘海栖“献给我们亲爱的父亲和母亲”的新作，也是继《有鸽子的夏天》《小兵雄赳赳》《街上的马》之后的第四部儿童长篇小说。自《有鸽子的夏天》开始，刘海栖将创作聚焦于50多年前的童年时光，在那条叫作“山水沟”的街道中，书写一群街道少年的成长故事，细密而流畅地讲述养鸽子的男孩海子、二米、鸭子等小伙伴的夏日经历，讲述刘家豪、何健、大亮子这些奔跑在“街上的马”，伴随着这些率真而富有个性的少年们的是同样出彩的大人们，如郭一刀、徐叔、赵理钱。他们身上洋溢着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特有的气息与质感，真实而自在地生活着，或狡黠或善良，或豁达或艰难。作家通过这个由形形色色的孩子与大人构成的山水沟，建构了不同于以往读者所熟悉的乡村叙事的另一个地域景观——城市街区的少年成长和生活方式常态。从这个意义来说，刘海栖的儿童小说是别具一格的。当然，支撑这群城市少年故事的还有他独具特色的叙事和语言，作家称其为“毛茸茸”的语言。

在《风雷顶》中，作家并未延续“山水沟”的故事，而是将童年书写的视线投向更为久远的时代，从作家亲历并了然于胸的童年时代拉回到久远的战争岁月，讲述父辈的故事。这样一种回到叙事难度的创作及其不事雕琢的自然圆融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儿童文学童年书写和叙事可能性的一种“构建和探索”，这部作品给读者最突出阅读感受就在于其童年书写与文学叙事的自在状态。

作家曾说：“我很感谢我的童年，我们像草籽一样，被风刮过来刮过去，在所有的地方生根发芽长大，长成自己的模样，为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亮出自己的姿态。”基于这样的童年观念，《有鸽子的夏天》《街上的马》描摹了一种自然率真的童年声音和姿态。不同于对作家童年记忆的打捞与呈现，《风雷顶》书写的是父辈的故事，父辈的讲述与叙事者的经历、感想、资料佐证有机糅合。全书分为“风过乡野”“雷鸣岁月”上下两部，以父亲对童年经历的讲述贯穿始终，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场或不在于场的聆听者、记录者、亲历者诸多身份自在地穿梭于父亲的童年、“我”的童年以及父子俩当下的生活状态中。

“我退休之后便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方便照顾。”小说一开始呈现的叙事者是一个退休的老人，照顾90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故事围绕隐含作者“我”与父亲的一次又一次谈话展开。作家特意保留了谈话的现场感与语态特质，“父亲说”“我说”“母亲说”在文中频繁闪现。经由“我”的整理与说书人般的再叙述，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串联丰富庞杂、看似散乱无序的人物、细节和故事，并在相应地方予以补充、解释，辅以必要信息的说明。“那是1954年，

2020年年初开始，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出不了门，就在家照顾老人，同时完成了这部小说《风雷顶》，是写抗战期间胶东孩子生活的。材料来源于父亲。写这部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经常听父亲说起小时候的事情，也读了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儿童小说，总觉得自己去不了那些东西，但迟迟下不了决心动笔。父亲年纪一天一天老了，90多岁了，听不清看不清了，他和老母亲都逐渐离不开人，我退休后就搬过去住在一起照顾他们。写小说的想法就又冒出来，于是每天请老父亲讲一点，用手机记录下来。积累了30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老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对于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一桩桩一件件慢慢讲来，如数家珍。问他儿童团的事情，他拿起笔，把《抗日儿童团歌》的歌词一字不差地写下来。这个歌我们小时候也学了，差我想起在音乐教室里，梳短发穿列宁装的音乐老师坐在前面，弹着风琴教我们唱。我们都挺着胸脯大声唱。我们这一代是距离经历过战争那一代最近的，我们和那一代人血脉相连，我们很多的记忆和生活痕迹与他们的互相重合，密不可分。疫情期间，我把这个小说写完了，也算了却了多年的愿望。

这是过程值得记述。

写作80年前的乡村，写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胶东农村的生活，写战争里的孩子和孩子眼里心里的战争，对我的写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一次挑战。首先要保证内容的真实，要给读者特别是孩子准确地讲一段历史，讲一个孩子的亲历和老后年的记忆。父亲的叙述基本保证了细节的可靠，但这不是准确的历史呢？毕竟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难免不受到年龄、活动范围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有可能出现误差，如果这个误差大到误导了读者，这部作品就失去了意义。我搜集查阅了大量资料，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脉络，对它在我党领导的抗战中的作用和价值，它的政治军事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

宪法颁布，给我起名叫立宪”“剩是小名，过去农村人有了孩子，取个贱名好养活，就叫他剩”“那头驴还有故事，以后慢慢说”“那是我们小时候很心爱的点心”等类似或解释或交代或插叙的语言，完成了有密度的写作尝试。

“看瓜的分两种”“知了分三种”“父亲对磨面很熟悉”“猪崽儿崽儿地叫了一路”，在父亲的讲述中，上篇的主要人物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以及金彩奶奶、福顺公、剩、小菊等悉数登场，每一个人物或细水长流地详尽道来或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却都有其独到的生命轨迹和精神样貌。作家在多人回忆或对话中展现了宏阔的历史与浓郁的生活气息。“杏分两种”“上学了”“过年了”这些素朴的标题却牵连出趣味盎然的童年往事以及多元绵密的家乡风物习俗，有童年小伙伴偷瓜的调皮行为，有放爆竹和各种吃食的欢乐，有赶山会的种种趣闻，有金彩奶奶的慈祥，有讲究的过年习俗，有父亲的上学点滴回忆……“杨树分两种”“看瓜的分两种”“知了分三种”，父亲的回忆中交织着过往岁月的热闹欢欣与贫苦不易，有艰苦岁月中人们的讲究与智慧、有人性与人情的美好。

如果说儿童文学是一种有难度的叙事，其沟通的是作者的成人生活经验与作为隐含读者的生命体验。儿童文学的叙事难度也正源于此，这就对作家的叙事调度与转化能力形成巨大考验。作家要以儿童能理解且不隔膜的方式展现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历史生活与人性的幽微隐秘。刘海栖对叙事的驾驭依循的是“生活流”的方式，娓娓道来的生活琐事，一次次闲话家常。全书并未安排贯穿始终的核心事件，有的只是父亲的讲述，而且故事的讲述中不断有跳跃、闪回，在很多地方甚至有作家跳出来的插叙。这种叙事的自信在下篇“雷鸣岁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下部聚焦战争岁月的书写与上部的父亲童年往事更有叙述的难度。在上部的结尾部分，作家巧妙地安排了结构的过渡，在过年和扭秧歌的欢喜氛围中不断强化人们对安稳生活的珍惜，接着笔锋一转，“后来鬼子来了”几个字，就将读者从充满生活气息和风俗的日常叙事带入到下部的战争岁月。

下部的开场依然是父亲的讲述，父亲再一次提到杨树，讲到学校的“接官”事件，讲到看电影，讲到住姥姥家的见闻，讲到打鬼子的故事。在下篇相对线性叙述的故事中，作家有意编织进了更多对战争与历史的思考。会看阴阳和风水响枪爷故事套故事的讲述，从“剩”到八路军刘得胜的成长故事，既延续了上篇民情风俗的奇趣好玩，又加入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个体命运。新鲜玩意手电筒、电灯等细节映射了时代变迁，“把电灯连着电线还有灯绳，

■创作谈

战争与孩子

——《风雷顶》创作自述 □刘海栖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对父亲叙述的重要细节和涉及的事件人物地点年代反复进行核对，去重要的地方实地考察，听熟悉情况的人讲述，梳理弄清史料中语焉不详的地方。对于父亲讲述中提到的风物习俗、那些植物、农作物、鸟类和其他动物，也都查证资料一一核对。通过做这些功课，保证笔下所呈现的历史和细节准确无误。

这又是一种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单纯的回忆录，要用故事、人物、细节等文学的要素去支撑作品。要处理好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二者之间应该互为表里，互相依托。就好比建一座大厦，基础栋梁和一砖一瓦都必须必须是真实材料，这样的建筑才坚固。而好的故事和人物细节是门窗和彩饰，吸引人驻足细看，窥窗窥景。观之不足，便登堂入室，去寻幽探胜，最终发现这是一座美好的建筑。真实的材料依然可以构建好的故事，关键是作者如何讲述。虚构的部分不能以牺牲真实为代价，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事件走向的逻辑，为真实的线索服务，去构筑更加饱满可信的真实。因此对于故事的选择、材料的取舍、人物的设定和性格的推敲塑造，整个作品内部关系的勾连，都要有缜密的思考和周到的设计。

语言是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语言不仅仅是形式，而且往往就是内容本身。我把很大的精力用在语言的打磨上，只有语言感觉对了，这个故事才立得住，才能使情节闪光，使故事和人物出彩。如何使语言明白晓畅，具有胶东特有的乡土气息，符合那个时代人物的身份特征，与细节互为映照互为枝叶，又能被孩子们接受，是我特别加以考量的。我努力把乡土语言书面化规范化，争取俗中见雅，雅俗互补，密实规整，又在节奏上符合孩子的阅读习惯，力争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毛茸茸的触摸感。

我的年纪逐渐增大，已经不是写作的黄金年龄了，但我还是要努力，争取写得再好一点。我要多读一些书，读经典，这对自已是一个补课。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作家，他们的文学功底很深厚，很多人是科班出身，系统地进行了学习。我则没有。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我读了些与战争有

关的作品。描写革命战争的经典从小就读，耳熟能详，深入我们的记忆，又读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西线无战事》等国外经典。我还无法证明这些国外经典对我这次写作有没有直接的帮助，但使我知道了文学能达到的高度，文学反映战争和生活能够多么广阔，对人性的开掘能有多深。同时也使我认识到，我们父辈所经历和参与的战争，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甚至更加惊心动魄，更加闪耀着精神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我们民族的坚韧性不比任何一个民族逊色，值得我们去开掘表现。

这部小说我一共写了八稿，从2020年1月16日动笔，初稿2月8日写完，定稿于9月2日。修改的过程中，超越越觉得分量重，越觉得有话讲，老父亲还不断提供新材料，于是很自然地就改起来。其实写作就是不断地把各种零件更精确地配置到作品里去，使手下的这台机器更端庄精致，运行得更有力。

有个细节，稿子完成后我发给老友张京请他提意见，他是有经验的童书老编辑，我们有持续40多年的友谊。张京看后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中肯的建议。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非常好，找到《抗日儿童团歌》歌词的作者了。是他朋友高义里的母亲。于是我和高义里通了电话。戈里兄老母亲于恒嘉老人12岁参加八路军，曾在胶东军区国防剧团舞蹈队当小演员。1941年她14岁时，根据战友在烟台读书时学会的《卖花姑娘》曲调，填词写出了《抗日儿童团歌》。这首歌经战友帮助修改，传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又流向了其他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进入小学的音乐课。于恒嘉老人晚年定居成都。我把这个稿子交给成都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常书社长和编辑朋友为它尽心尽力。而张京就当过这个优秀出版社的社长。我们的事业就是这么一代一代前赴后继的。

这是我退休后写的第四部儿童长篇小说，我还会继续写一些。我慢慢地写，写作应该要有敬畏心，只有敬畏，才能精益求精，才能去追逐更高的目标。我清楚我的状态和年龄，我希望能走得远，不需要走得快。我会努力。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